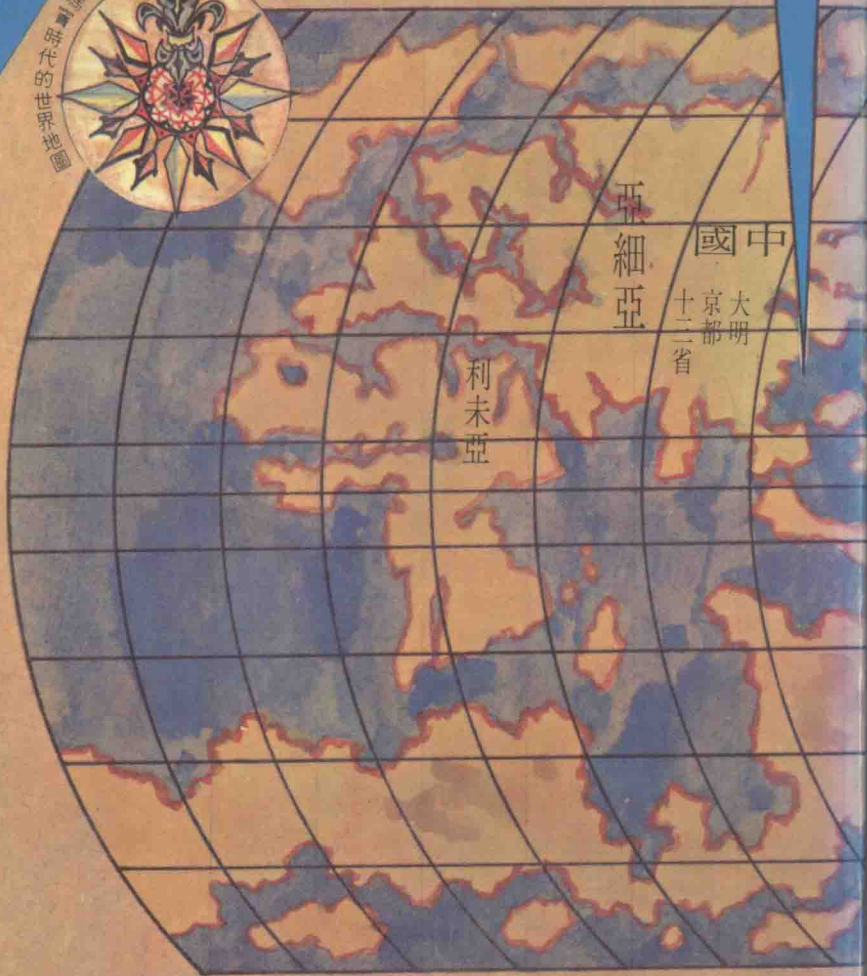


置位之灣台

本訂增

華蘭地圖
時代的世界地圖



學文較比 向方新之究研

著·三達李



增訂本

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

李達三 著



67·5·0256

·81016·

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

著者 李 達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一—二三一七
郵 掛：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增訂四版

定價：平裝本一五〇元
精裝本一九〇元

再版序

本書二版內容大致和初版相同，除初版排印錯誤之處業經改正外，內容方面亦有修改增補之處。尤以結語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頁二六五——三〇七），及附錄書目部分（頁三〇九——三六九）更甚。

初版問世後的短短三年之間，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也有人提倡用「中國成分」[The Chinese Dimension]的講法）有許多不尋常的發展趨勢。這種新現象，本來可以在比較文學史一章（頁七九——一五〇）的中國部分裏加以補充介紹，可是我希望能在意識形態的範疇裏對整個問題加以討論，而不僅僅當作歷史現象來處理。

再版後最顯著的改動在書目部分。除了書目的範圍已經擴充，增收了一些有關思想文化及非英美文學的研究資料之外，並且全面地把最新的项目包括進去。書目的編排形式也因此作了相當的變動，但編年的原則保持不變。書目仍然分類加以介紹，並依照編年的次序排列，可以幫助嚴肅的比較文學工作者從各種出版刊物中追溯比較文學的演變和發展；而圖書管理及書目工作者，亦可藉此參考新近的出版項目以增補藏書。初版個別論文條目的編排原則

是，所有能見到的文章都附加註釋；此外，凡同一論集收集的有關文章超過三篇，一律收入書籍部分（頁三一三——三二五），而其他單篇（包括少數報章副刊的文章）則統歸「中外文學月刊以外之有關論文」部分（頁三二七——三五八）。二版的修訂書目，散篇論文的註釋一概取消，並將冠于某些條目之上，用以標記該等文章有特殊意義的符號，也一併刪除。不過，爲了方便在第六章（頁一九七——二一三）裏分類，選介一些涉及比較文學基本觀念的文章，「中外文學」所曾刊載的論文仍另歸一類。整個書目的收集及編纂截至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修訂稿送廠以前爲止。今次書目的搜索網已比第一版的大大擴闊，然而我得承認有部份仍然未能獲得完全的出版資料，深感歉意。

最後，我必需藉此機會對協助本書順利再版的多位朋友致謝。鄭樹森博士和黃維梁博士在書目方面，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陳清僑先生、譚景輝先生、左治強先生及張隆溪先生熟練的研究工作，以及梁麗娟小姐辛勤的文書工作，都給予我莫大的幫助。

李達三

七十年十二月卅一日

自序

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

前言

這些文章原是爲了配合臺灣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的特殊需要而陸續寫成的。許多同仁建議我匯集成冊，藉供參考。幾經潤飾、修訂與重排，儘量使本書具有連貫性與整體性；相信用在中國研究比較文學的理論與方法，由一位作者獨力發表的研究成果當中，這是第一本較完備的書。這雖是初步的介紹工作，但是我懇切希望它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藉以激發那些成熟的學者及初學人士一起來開拓這塊極富刺激性與挑戰性的園地。

內容

雖然筆者接受的教育是英美文學方面，但對比較文學發生專業性的興趣，實始於民國四

十五年初學中文之時。八年後，我才將研究心得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做成系統的整理。就在那時，我寫了一篇題名為「中西文化與文學的關係」的論文，內容就包含了今天這本書的初步概念。文中提及一個溝通文化的使者所肩負的雙重任務時，我曾引用埃及亞力山大大學的孟拉博士所說的一句話：「你想輕鬆地肩負一座橋樑的任務而不被踐踏而過，那是不可能的。」

這些文章是我個人十二年來的教學心得與「研究—出版」的一些成果。但我求保持坦誠客觀的態度；但由於深受本國文化的影響，可能難免還有「美國佬」的成見。所以，我懇求讀者不要誤解我的好意，以為我這個人竟敢隨便地對中國文學妄加置評。

本書名為「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我用「新方向」三個字，是因為我相信東西比較文學研究無論在時間或空間上，都處於轉換點的十字路口上。或者是東方襲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或者是我們鼓起勇氣，向前邁進，以中國特有的觀點，找出新的方向。此話並沒有忽視舊有的智慧的意思（不論是中國或西方），而是呼籲大家在經驗世界得到一嶄新的觀念，切勿以安全或穩定為藉口而拒絕革新。

為了使比較文學研究能兼具現代學術觀點以及中國文學傳統精神，我用一條共同的主題線索將這幾篇文章貫穿一氣。換句話說，西方的比較文學專家經常忽視了中國文學中的潛在價值。所以本書有意不斷地把中西比較文學置於二十世紀的國際學術領域內，以糾正西方比較文學家的缺失。

身為一個外國人，我原本沒有資格來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基於這點自知之明，我只能

就能力所及來從事若干研究或提出一些問題，和大家共同討論。讀者不難發現書中所舉有關中國文學的例子，都是最淺顯易見的。我認爲挑選最適切的例子，來作比較或對比，應由中國文學專家們來做較爲恰當。本書是以最方便的形式匯集西方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是以書中充滿了許多引語與參考資料），其目的是希望在中國學術界激起迴響。限於筆者所學，本書所論常偏於英美文學傳統。其實，這些研究都可以適用於中國文學的論題。要是能够從中國的文學經驗中找出特別的題目，予以有系統的研究，將來一定會出現一套配合中國文學精神的比較文學理論與方法。

從事一項嚴肅的學術研究，首須瞭解自己所探討的問題在國際學術界已有了多少成果。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學者們應一味模倣西方的成就。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知識的領域浩瀚無邊而人生短暫倏忽，實在不容我們由於不諳國際學術現況，重蹈前人的錯誤，或重覆別人研究過的問題。爲了向西方的學術假設挑戰，我們必得瞭解這些假設以及其發展過程；就是要對促成西方比較文學發展的文化背景及批評觀念作一番徹底的調查。這些文章絕非定論，而是希望指出若干新舊不同的研究方向，期使學者在邁向比較文學研究的路途中，不致落入陷阱。對於預備邁向比較文學這條漫長而艱辛的旅程的人而言，本書附有兩種基本輔助工具：（一）比較文學基本術語，共有二百個，大部分源於英文、法文、德文等，以中文解說定義；（二）重要書籍及論文的書目選註。

書中文章的次序並非依其發表先後而定，而是根據其內容性質編排，以求連貫完整。頭兩章是背景研究。第一章把中西比較文學放在「中國研究」的大體系中，便於讀者明瞭如何

藉比較研究方法以充實「中國研究」。第二章在追溯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研究的獨特貢獻及其發展經過。第二部分屬於歷史性質。第三章介紹東西方的重要學派與學者。筆者並以此為基礎，根據中國的文學經驗，在第四章中推行出若干可行的建議。第五章提供教育哲學，正確的文學態度，以及中英文學教育的實際應用。第六章更切實際，對比較文學實際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了一番有系統的說明。最後二章則闡述如何運用其他學科的知識與方法以從事比較文學的探討，例如第七章的「文學與神話」及第八章的「文學與思想史」。最後一部分是結語。

形式

本書從封面設計到索引，處處都希望將內容發揮透澈。如果說本書重要的潛伏主題之一，是「文學有機體概念」（請參看第六章的摘要），那麼形式與內容應該是相輔相成而不可分割。所以本書儘管研究範圍龐雜，由於有完整的研究方法，讀者當不致於繁複多變之中感到迷惑。在文字風格上，我必須承認，翻譯這幾篇文章確實是件頭痛的事，因為我經常把許多相關的觀念按其從屬關係，籠括在一個長而複雜的句子裏。這種文體或許正可配合主題上的複雜性，但却很難找到適當的中文語句來表達得淋漓盡致。此外尚有些細節可能會因惱讀者，容我在此作一番解釋；書中常有相同或類似觀念出現，這現象部份是由於本書的性質所致。這些文章原是陸續寫成而後匯集成書，難免重複。然而，我並不因此歸咎於編排上的疏忽。有時，這種重複正可以強調同一觀念在不同問題上的意義與重要性。

封面與封底上的地圖是有其特殊的用意。它是由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第一版（一五八四年）改製而成的。這張地圖上的陸地面積比例與今日的不盡相符（不知是否由於利瑪竇的幽默感所致，還是後來的複印者有意的疏忽，利氏本國意大利並沒有出現在地圖上。）儘管地形如此，這種歪曲正可用以說明西方學者以西方為主之思想傾向的改變。例如：這張地圖的最大特色是中國被畫在中央，雖然以中國為中心有偏愛之嫌，但本書的重心是中國，所以讓中國居是十分適當的。此外，這或許有預言效果，因為二十世紀有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曾說，未來世界文明的重心在亞洲。地圖上端的羅盤也有其象徵意義，因為這種工具能隨著我們所處位置不同而自我調整，以指示我們應朝的方向。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比較文學基本書目選註」。這是特為東西比較文學研究挑選的基本書單。雖然中文的比較文學書籍十分稀少，但發表的文章却相當多。在這方面，「中外文學」擔負了重要的開路工作。適逢其創刊五週年紀念，我們將「中外」裏有關的文章列出，並挑選最重要的二十篇文章，加以星標。在第六章中每提到這些文章皆用號碼表示，以便對照參考。書目中所列的參考資料皆可在耕莘文學院圖書館找到。

書後尚有「比較文學常用語彙」。這些語彙雖然不够完備，但研讀比較文學作品時，常見的西方重要術語，幾已囊括無遺。這些術語在中文詞彙中將按筆劃排列；在西文詞彙中則按字母順序排列。兩種詞彙皆予以編號以便互相參考。

本書無可避免地會涉及許多外國專有名詞和文學術語。文中如一律加附原文，可能會使讀者不勝「轉頭」之苦。因此，我們將重要名詞的原文移至書末的索引或詞彙中。讀者如欲

參考，可查閱書後「比較文學常用語彙」或索引。索引分二部分：中文名詞按筆劃順序排列；西文名詞依字母順序排列。

在此，我要感謝曾給我鼓勵與幫助的所有師友及學生。我從他們身上所汲取的遠比他們想像的多。篇幅有限，在此無法一一致謝。由於他們的開拓與努力，比較文學才能滿懷信心地邁向未來。因此，我謹向他們獻上此書，藉表謝忱。

我要特別感謝袁鶴翔博士和陳東榮先生。袁教授曾仔細替我校閱原稿，並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陳先生花了許多時間和心神，耐心地校訂原稿；書中不少紊亂不清的細節，都經他審慎的處理，最後全書才能勻稱一致。由於陳先生的協助，本書終於能夠順利出版。「比較文學常用語彙」是臺大比較文學博士班同學多年來的心血結晶，由蔡娜娜小姐作最後的編訂。陸潤棠博士和鄭樹森博士對於這個部分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意見。在書目資料方面，陸、鄭兩位先生提供不少資料，周樹華小姐與張漢良先生幫忙甚多。同時也感謝蔡濯堂、周英雄、黃維標三位先生校閱本書。每位譯者在翻譯我複雜的英文長句時，都費盡心思，我將在每章前的摘要裏分別致謝。序文和結語的部分分別由施秋月小姐和陳東榮先生譯出，在此一併致謝。同時，我要感謝沈謙先生；沈先生曾熱心奔走，助成本書的出版。最後，我謹向聯經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致謝，由於他們的幫忙，本書才能問世。

目錄

再版序

自序

第一章	中國研究與比較方法	一
第二章	美國對中國研究的貢獻	三七
第三章	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	七九
第四章	比較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五一
第五章	比較文學研究的思維習慣	一六九
第六章	比較文學的基本觀念	一九七
第七章	文學與神話	二一五
第八章	文學與思想史	二五七
結語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	二六五

附錄

(一)比較文學基本書目選註	三〇九
(二)比較文學常用語彙	三七一
甲 中文術語及定義	三七四
乙 西文術語	四三一
索引	一
甲 中文索引	四五—
乙 英文索引	四六—

第一章 中國研究與比較方法

本章首先述說中國研究的本質與範疇，及拓展比較文學必經的途徑。其從屬的但也相當重要的目標，是應用比較方法，在世界文學的脈絡裏，重新觀察評價中國文學。文末，略述中國研究及比較文學研究的簡史後，繼續發掘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綜合性」的研究態度將使此兩種學科相得益彰，內容更爲充實。假如中外學者能依據一種方法學來合作，這種方法不但是綜合性的、富伸縮性的，而且穩固地建築於傳統的中國學術研究上，則比較研究得以增強，同時也向我們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及欣賞能力挑戰。

本章譯者爲徐言之，原載「中外文學」，五卷十一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頁一四零—一六八。

序言：研究的目的和態度

過去幾年，筆者曾對「中國研究」^①及「比較方法」這兩門學問做過努力；本章旨在將個人研究的心得提供出來，聊備參考（而討論到「比較方法」時，重點則放在中西文學之間的關係）。^②本章所採用的並不是專業性漢學家的論點，而純然是一個喜歡中國學問，愛好漢學研究者的觀點；但是筆者相信，個人的這點小心心得，不論對專業性的漢學家或業餘的中國學問愛好者而言，都可能會使他們感到興趣。

首先，我將談到研究這兩種學問而又希望有所收穫者，所應具備的態度；然後再對這兩個學科的名稱做一番描述性的定義工作，看看誰最適合鑽研這兩種學問；再其次筆者將很快地回顧一下漢學和比較文學發展的歷史；最後，針對這兩種學問，提出一個具體的研究方法，並對這個研究方法的重要特點，加以討論。

研究這兩種學問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綜合性」的心態。這種心態經常能使人追尋完整和統一、找尋各種事物間的相關性、並求統合所有相異的經驗事實。用在漢學和中西

① 見「漢學研究在美國」，「幼獅學誌」，十三卷一期（六十五年十一月），頁一九一——二二〇。本期是「漢學研究中心專輯」，旨在呼籲於臺灣設立「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參見沈謙，「從文化沙漠到漢學研究中心」，中央日報，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副刊；以及「設立兩個研究中心的建議——關於所謂漢學研究中心與中國大陸情勢研究問題」，大華晚報，六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社論。

② 見「比較文學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淡江評論」，六卷二期及七卷一期合刊，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頁二一九——二二八。譯文將刊在「中華民國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集」。

比較文學關係的研究上，這種「綜合性」心態的運用，常能使人意識到這兩種學問於各自發展的歷史中，確實有許多共同點。而這種從相異學科的研究上，發現到相同點的事實，自然是要令人深思的。在本章「歷史背景」一節（頁一三）中，筆者將詳論「綜合性」心態的總內涵。

所謂「綜合性」的心態，它的一個重要的含意，就是指是否有能力將各類問題，按照某個適當的價值體系，將它們作妥當的安排，使其各有所歸，各有所從屬。雖然「中西比較文學關係」的研究，是一個範圍廣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學問，但是這個學問最好還是放到最廣義的「漢學」中去研究。換句話說，凡從事和中國有關的比較文學研究，而又要有所收穫的話，「漢學」都應當是這一類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一個真正澈底的文學研究者，多少也應該是一個文化歷史學家。

從事這樣一個深廣的研究工作，除了具備「綜合性」的心理態度外，還需要一種奉獻的精神——情願貢獻出一己所有力量，矢志努力不懈於「中國研究」的賡續。我之所以用「賡續」兩字，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為我相信沒有哪一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會享受到所謂的「最終極的成就感」；至多，他能從推動世人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中，去覓取一些欣慰。這種心態，應該是所有中外學者都要懷有的才對，雖然每位學者研究的項目互有不同，各有專長。

不久以前筆者曾就漢學的研究發表了一次演講，中央日報的記者在報導該次演講時，轉述了這樣的一段話：「中國的漢學家應摒除己見。也許中國的漢學家看到外國的漢學家談

中國文化的粗率態度會感到驚訝；但西方人對於中國學者的保守自滿態度也同樣感到苦惱」^①。學術成果的交流過程中，如果要避免彼此互相倨傲輕鄙的現象，最好的方法便是採取一種嚴格的客觀和截長補短的互助態度。而這樣的態度並不是憑空能有，它必須是建立在真誠的謙虛和互相的寬容之上的。幾世紀來，列強對中國所表現的無禮、誤解和偏見，使得中國人對輕蔑一事變得非常敏感；近年來美國漢學家的鼓動驕然，汲汲地誇張並自傲於他們自己的成就，也使得不少中國學者感到不快。但是事實上在很多美國大學裏，一些漢學專家之所以喋喋不休於他們那一點點的成就，其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正面臨因經濟困難所導致的生存危機；他們並非真的夜郎自大，自以為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便足以代表整個「中國研究」^②。問題是他們必須面對現實，試着向社會推銷他們研究的成績，以吸引更多的學生來註冊；學生人數多，各大學才肯將與「中國研究」有關的經費編入預算，否則「中國研究」這一學科將會淪為一個不重要的小系，甚或真的被學院從課程表中剔除。不久前，一個任職於柏克萊城加州大學的朋友，曾經向我吐露他所任教的學系，目前所遭遇到的困境：「我們現在給逼得幫着一些很有前途的漢學學生早點離開學校，即使還不到時候，也要幫他們速成學業，因為那些給錢的機構只肯給他們短期的經濟資助。」今天我們在自由中國的一些大學裏，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來此地修習中文的美國青年，他們看上去幾乎是漫無目的地在各大學

① 楊文俊，「臺灣最宜研究漢學」，中央日報，六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版。

② Elling O. Eide, "Methods in Sinology: Proble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No. 1 (Nov. 1971), 134.